

■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这期《两江潮》，我们将带你走近鲇背老人陆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的第一批文艺工作者，他与新中国文艺相伴同行整整70载。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艺工作者心系时代、为人民书写的情怀。

——编者

“九零后”陆桀



陆桀近照。

欣之助供图

字戟甫。这少见的‘桀’和‘戟’字，是祖父取自王勃《滕王阁序》里的一句‘桀戟遙临’，祖父引经据典地为儿孙取名，大概是希望我们这儒医门庭多些书香之气吧。”

生活在北平时，陆桀是个并不出众的普通孩子。“我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部附属幼稚园上学，可能因为父母有文化，自己也爱看书，我的唯一过人之处可能是学习好一点。”

回到成都后，陆桀很快成了家族焦点。“在布后街1号的大家庭里，长辈和哥哥姐姐们都很稀奇我，因为那时整个成都能说地道北京话的娃儿都不多，北平回来的娃儿就很突出了，加上我在幼稚园学会了十几首歌，大家一鼓励，我难免也有了表演欲。”

也是因为语言优势，陆桀第一次出演了话剧。“我在省立成都中学上高中时就开始接触话剧了，那时演话剧第一要素是会北京话，至于演技么，都是学生娃儿，随便咋个演。哈哈，也是好笑，我第一次登台是反串女生。当时学校跟社会剧团联合排演了一个戏《林冲》，我人比较小，个子不高，北京话地道，于是被选去演林太太的丫头。”

叁

因为父亲工作调到重庆，陆桀也在1948年考取了重庆大学。主修化学工程的他，凭借中学时的演出经验和语言优势，很快成为了文艺积极分子。

“重大学生活动很多，尤其是刚解放那段时间。我那阵对演戏、合唱等文艺活动越来越积极。我长了个子，普通话好，终于在话剧《思想问题》中出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可惜是个反动军官。不过与阎肃相比呢我还是满意了，他那时参加的话剧基本都是跑龙套，演学生甲乙丙之类……”

陆桀与著名艺术家阎肃成为同志和好友，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他俩在重大活跃时。

“我学化工，阎肃学商，我们因为社团活动经常见面，他是华北逃难来的，我们很要好。他在南开读中学时就热心文艺，到了重大还帮着南开排歌剧。呵呵，别看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他爱读书，才华横溢。解放后上面来重大物色青年艺术工作

队人选，我和阎肃首先就被动员起来。阎肃说一起去，我说好。于是1950年9月，我俩还没毕业，就跟十几位同学一道背着书包，从沙坪坝徒步四小时到了市中心的青年会，正式走进了文艺队伍。”

陆桀记得，解放初的重庆文艺界群星云集，“有左联时期的文艺前辈任白戈、沙汀、艾芜；有上世纪40年代活跃的作家、演员；有曾驰骋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战斗团社’；有参加解放大西南来的各路文工团队；还有散落在市井的川剧、京剧、杂技、曲艺班社等。我们这些只在学校里唱过几支歌、跳过集体舞、演过几回戏的男生女生，忽然从读者和观众跻身于和他们同属一界，太神奇了，就像流萤飞进星光灿烂的天空，多么期待能闪现几点细微的光亮。”

这些年轻人怀着火热的心，怀着革命的激情，像重新进入文艺小学一年级的小学生一样从零学起。

“那时讲究‘一专三会八能’，二胡、快板、相声、灯光、拉幕……全都要学，我记得老同学阎肃还曾下腰劈腿学跳过苏联舞哩！不过后来领导们综合考虑，认为我们可能艺术资历较短，文化水平较高，于是让我们走下舞台，从此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的道路。”

“再后来的故事呢，大概很多读者朋友也知道了。1951年，我从艺术队抽调去南川县石莲乡杨柳村搞土地改革，和同事一起搜集了不少山乡民谣，我们填词谱曲完成了一个音乐组歌作品《我们的山歌唱不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歌舞演出团体完成的第一个大型本土原创节目，在重庆、四川、北京演出都大受欢迎，拿了西南地区歌曲创作一等奖。作为两位词作者之一，我终于有了处女作，也坚定了未来几十年从事创作的信心和决心。”

70年来，陆桀笔耕不辍，收获累累硕果。他的创作横跨诗歌、填词、散文、戏剧等多领域，完成了《灯的河》《重返杨柳村》等诗集、《大巴山的回声》散文集、《江姐》《火把节》《哭嫁的新娘》《海岛女民兵》等大小歌剧近20部。

其中，《灯的河》《重返杨柳村》被誉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诗集”；1962年完成剧本、1963年在重庆首演的歌剧《江姐》，则是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第一部歌剧，奠定了重庆歌剧的地位；而集合

成渝线上

上。候车厅里，人山人海。人们大包小包，紧张地等着自己的车次。因为，火车在此停留的时间不过三秒钟而已。

终于，我们的车次到了。不等列车员招呼，我们都使出吃奶的力往车上涌。小舅在前，三哥、四哥在后，前拉后推，好不容易才护送小舅的外婆上了车。姨妈则使劲把我往车上推。

这是一列所谓的“闷罐车”，连车窗都没有。车上人挨人、人挤人，又闷又热。好不容易捱到红花塘车站，大家又是推推挤挤，好一番挣扎才下了车。

上世纪90年代，看《席卷大西南》时，我才了解到巴蜀百姓为了成渝线铁路，已经等了半个世纪。

这是中国西南的第一条干线铁路，也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条铁路。重庆钢铁厂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鞍山的钢锭、上海的钢梁、武汉的机车通过长江和沱江进入四川腹地。成渝铁路实现设计完全由中国人完成，建筑材料全部国产，是我国坚定向工业化迈进所创造的奇迹。

世纪之交，去武汉上大学时，再次踏上成渝线。上车那一瞬间，心中顿时升腾出一

种独自走天涯的豪迈。

那时，成都到武汉要整整32个小时。求学时，春运乘车，最让人心烦。运力，似乎永远都不够。买车票，最发愁。

我总是要提前半个月到成都北站排队买票。走的时候，也要提前一天便到北站找一个招待所住下。唯有如此，才能保证第二天坐上车。

火车上总是满满当当，走道里，厕所里是人，座位下还躺着人。车上的味道最难闻，说不清到底是厕所的味道，垃圾的味道，还是人们身上散发出的味道。

那时，去沿海打工的人最多，也因如此我们能够从众人口中很好地了解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发展状况，以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学生们更多的是聊学校、专业、学习，以及考研还是直接就业等问题。

弹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再回头，才发现每个人都了不起。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自觉地卷入了国家迅速崛起的时代洪流之中。

后来，我又去乌鲁木齐求学。其间，要翻过秦岭，穿越千里河西走廊，通过茫茫的

走过东街解放路

□唐利春

东街，其实不是一条街，而是指南川这座渝东南小城东边一个8万平方米范围的青年文化小镇，一个由旧城区蜕变而来的城市新地标，一个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特色街区。

一

东街，还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叫解放路。

一条路的名字，包含着一段历史的铭记。1949年，南川和平解放时，满心欢喜的老百姓义务修出了一条迎接军队入城的好路，在街道两旁迎接刘邓大军入城。解放路就此应运而生，串联起解放巷、解放食堂、解放米馆等小巷、店铺，蕴含着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更承载着奋斗的记忆，传递着美好的期许。

在东街城门洞，有一堵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古城墙叫城墙碛，那沿着墙脚恣意蔓延的苔藓和爬山虎，一岁一枯荣地在漫长的时光里见证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9年11月25日深夜，这段城墙率先见证了刘邓麾下先头部队二野第三兵团11军31师侦察连140多人，踏着泥泞的川湘公路，冒着蒙蒙细雨，从黄泥堡进入东街，随后解放军大部队进入，没费一枪一弹，和平解放了南川。

徜徉东街后街的刘邓大军驻地旧址，白墙灰瓦的平房里，一行行文字、一件件实物真实地记录着那段峥嵘岁月。

1949年1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移驻重庆，刘伯承、邓小平等二野首长在此打地铺住宿，他们视察南川县城，与周边老人交谈，对县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人民安居乐业，十分高兴，称赞南川地下党组织在和平解放中作出的积极贡献。

在东街文化路，苍松翠柏之中的烈士陵园静静坐落，这里安放着牺牲在南川的50余名革命烈士忠骨，山东籍、河北籍、湖北籍……那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于此。

有着24年党龄的我，在此一次次重温入党誓词，每一次都激动无比、心潮澎湃，这一份庄严的承诺必须铭记一辈子。

这就是东街，一处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地标，在城市记忆深处留下刻骨铭心的烙印，更深深地融入一代代南川人的血脉和灵魂。

二

每周三下午，“承铄讲堂”的红色故事巡回宣讲活动会在东街解放路准时开讲。

“承铄讲堂”以出生于此的烈士古承铄名字命名。志愿者们希望以此来重温波澜壮阔的红色记忆，铭记先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假如山崩地裂，假如天要垮下，假如一动就会死，假如有血才有花……”35岁的吴娟大学毕业后外出打拼多年，最终还是回到生养自己的东街，做了一名社区工作者和骨干志愿者，古承铄的故事从她朗诵的诗歌《无题》开场。

古承铄年少时靠做客店学徒、杂役等苦力补贴家用，饱经磨砺之后，他创作出了众多脍炙人口的革命诗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又以重庆川盐银行职员的工作为掩护，参与《挺进报》的刻印工作，后在歌乐山麓慷慨就义，时年29岁。

“我是听着解放军故事长大的，经常听妈妈讲述刘邓大军进城露宿街头不扰民的情形，也亲历了南川的发展。”69岁的周锡容阿姨下过乡、进过厂，坚持做志愿者10多年来，交通劝导、邻里互助、疫情防控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在她声情并茂的讲述中，一件件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往事，一段段改天换地的建设征程展现眼前，催人泪下。

我也是“承铄讲堂”的一名志愿者。很庆幸，我能以烈士后代的身份加入这个行列。

南川籍烈士张鸿沅是我奶奶的四哥，也就是我的四舅公。他在北京工专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撰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在任西南大学总务长、中共西南大学支部书记期间，他主办《西南日报》，以教学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牺牲时年仅26岁。

我不知道四舅公长什么模样，对于他的生平点滴事迹也只能通过史料记载和幺舅公的回忆了解，但我始终以他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川黔边游击队的奠基人韦秉成、组织“南川青年社”的汪石冥，还有和平安年代涌现出的“救火英雄”程方伟、“英雄狱警”刘彦……“承铄讲堂”聚集了道德模范、优秀党员、普通市民等骨干宣讲志愿者30多人，通过故事、朗诵、快板等形式，讲述革命年代的红色故事以及新时代的发展见闻。

初心的力量、信仰的光芒，随着一个个隽永的红色故事流淌而出，迸发出激荡人心的精神力量。

三

东街，承载了太多南川人深沉而久远的记忆，也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勤奋与坚持。

这里，曾是最热闹的商业中心，最高楼房在此，最大商店在此，最红餐馆在此，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吃一口“解放食堂”松软香甜的老窖馒头，煮二两“傅记米粉”丝滑爽口的手工粉，喝一碗“韦家豆花”嫩滑醇香的豆浆，不知唤醒多少人记忆深处的那一抹久违的温暖。

东街变了，随着岁月变迁、社会发展，他像一个饱经风雨沧桑的耄耋老者，逐渐沦为拥挤破旧的棚户区。

改造东街，成了几代人的夙愿。

2018年以来，南川区委区政府顺应民心，在保留城市肌理和历史记忆基础上，改造提升东街棚户区，打造以小镇青年文化记忆为核心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还原近40年的大众生活印记，让东街连接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东街没有变，三年的时间，“修旧如旧”再造而成的东街迎来凤凰涅槃般的重生。每一条街巷，都在自然生长。倒走的时钟，熟悉的油漆墙、亲切的黑白电视，昨天的热闹似乎未曾远去。

每一段时光，都充满着浓浓的乡愁，照相馆、理发店、裁缝店等市井生活再现，三大件、连环画、自行车等，以真实布景还原不同年代不同家庭的生活场景，构建起东街记忆的主轴。

东街，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无声地见证着南川的发展变迁，真实地记录着城市的过往。

关于东街的故事，还在继续……

□欣之助

壹

轻轻敲了两下，门开了。门后是身材娇小的万荣婆婆，她一边喊了声“老头子，客人来了哟”，一边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子。客厅沙发上，陆桀老爷子正捧着一本宋词。

放下书，转过头，摘掉花镜，陆老笑呵呵地招呼我：“欢迎噢，快来坐。”声音中气十足。他撑了撑沙发扶手，试图站起来相迎，腿脚却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我赶紧上前，挨着他坐下，稍稍寒暄，我们打开了话匣。

这是2021年12月，重庆又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陆老的生日也在12月，1931年出生的他，今年已足足90高寿了。

90年似乎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时光，漫长到身为“八零后”的我暂时还没有办法去细想。而“九零后”的陆老却说，过尽千帆，这段长长的岁月仿佛也就一眨眼。

长长的路要慢慢地走，倏忽之间走到了晚霞漫天的路口，才惊觉“韶华不为少年留”。

“我平常很少出去，每天就在家看看书，古典诗词读得多一点，秦观的这句‘韶华不为少年留’呢，我就还蛮喜欢的。”陆老眯着眼睛笑，“我年轻时更欣赏苏辛词的豪放大气，现在老了，反而偏爱起了婉约派，姜夔呀周邦彦呀，静静地细品，读起来真是有味道。”

著名剧作家、诗人，重庆市文联原主席、荣誉主席……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第一批文艺工作者，20岁便早早开启了创作生涯的陆老，是文艺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虽然对种种头衔并不在意，但他其实也有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

“我呢一辈子没干啥，都跟写作打交道了，现在想想看，这人生漫漫啊，我真是何其有幸，能与新中国文艺相伴同行了一整整70年。”

貳

陆桀与文艺的缘分，似乎冥冥中早有注定。他的人生传奇，要从布后街1号说起。

布后街位于成都老城区的明清布政使司署后面，文脉延续500多年未曾中断。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联、四川日报社等文化单位落址于此，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史掌故。

布后街1号正是陆桀的祖居。他的祖父、清末民初“川内十大名医”陆景庭在此行医，大家族一派蓬勃景象。祖父去世后，医馆由二伯父陆仲鹤率堂兄陆干甫诊脉处方。祖父的卓著声望甚至令巴金都难忘。这位成都老乡的《家》《春》《秋》里，出现了以祖父为原型的人物形象。

陆桀并没见过祖父，他在北平出生，长到6岁才第一次随父母回到成都。

“我父亲从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毕业后，在平汉铁路的前门站做副站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带我们搭火车回川避难。那时祖父已去世，很遗憾我们未曾见面。但我的名字却是祖父取的：姓陆名桀

□余冠军

此刻，我坐在去成都的高铁上。

由于家人分居成渝之间，我们便成了成渝线上的常客。我常常利用这段时间读读书、写写东西，1个小时的车程也显得轻松惬意。

车厢里非常安静，人们气定神闲地看书、听音乐或者玩着手机。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群山，不由得让人思绪万千。

小时候，在乡下每天都可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呜……呜……”的声音拉得老长。老人们只听火车的鸣笛，便能够辨别出第二天的天气。清晰响亮，一定会是大晴天；低沉而朦胧，定会是坏天气。得闻其声，不见其面，让我对火车充满了好奇。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队买了电视，我才通过荧屏见其样貌。

8岁那年，因去金堂走亲戚，我有了第一次坐火车的机会。

彼时，家乡衡阳的火车站非常繁忙。蒸汽车头，呼呼喘着气，来回调度着车皮。货运道上，男人们满头大汗，光着膀子，将煤炭、粮食、化肥等物资匆匆忙忙地卸在站台